

网络“售假售劣”为何屡禁难止

新华社南昌3月15日电 用处理过的图片、顺手拈来的同类商品视频，甚至“刷”来的好评吸引消费者购买……近年来，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发展迅速，电商、微商上存在的虚假宣传、售假售劣等问题频频引发消费争议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消费者维权成本高、地下产业链不断演化、线上线下打假联动难是网络售假售劣痼疾难除的原因。专家呼吁推动建立覆盖全网的失信惩戒机制，逐步实现网络市场交易的社会共治。

■ 有商家用假图、“刷好评”
江西的李女士已不敢相信网上的原单货。“店家要么盗用国外正品的宣传图，要么实拍后用美图软件进行处理，到手的商品和宣传图片相差甚远。”李女士说，有色差都是小事，有的甚至还有洗不掉的异味，接触皮肤后出现过敏现象。

中国消费者协会2018年开展的“电子商务法消费者认知情况”问卷调查显示，在1.2万份有效问卷中，一半以上受访者认为“假冒商品屡禁不止”是电商领域最突出问题，其次是“质量不合格商品较多”和“线上线下商品质量不一致”。

目前，越来越多的网购平台方开始协助执法机关打击网络售假行为。2018年，阿里巴巴共向执法机关推送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634条，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1953名，溯源打击涉案金额79亿元。

相比于“售假售劣”，“刷好评”现象则更加普遍。北京的何先生听说左旋肉碱有助于减肥，便找了一家好评高的网店购买了几盒。“吃了几天觉得舌苔不适，客服说再吃几天就好了。”何先生坚持吃了两个星期，结果出现了头晕、厌食等症状。“他们还让我给好评，说给好评后返现20元，原来好评都是这样来的。”

业内人士分析认为，在难以直接触及商品的网购环境下，消费者会倾向于销量高、好评高的商品，但不良商家会利用人们这一消费心理，通过炮制虚假评价获得利益的最大化。

■ 多重因素致网络“售假售劣”屡禁难止
记者调查发现，消费者维权成本高、灰色利益链不断演化、线上线下打假联动难等因素使得网络“售假售劣”现象屡禁不止。

一是违法成本低，调查取证难，诉讼成本高。据中消协“电子商务法消费者认知情况”问卷调查显示，七成受访者在网购中买到过假货，但其中仅12.1%消费者成功获赔。鉴定困难及商家不承认是难以进行合理维权的主要原因。

二是灰色产业链不断演化。一些业内人士指出，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，一些灰色产业链也在滋生。“为了躲避平台对刷单行为的严厉打击，现在很多刷单组织者从线上转移到线下，在高校周边、地铁口、商场等人流密集处进行‘地推’，给刷单的防控和识别带来了一定的困难。”一位电商平台“反刷单”业务部门负责人表示。

三是线上线下打假需加强联动。“平台打假只能线上关店，对于线下的制假窝点却无能为力，有必要加强源头根治。”一位电商企业平台治理部负责人说。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表示，目前部分平台经营者主动发现违法行为并向监管部门报告仍不到位，有待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予以推进。

四是信用评价缺乏统一标准和专业人员。业内人士表示，目前对网购经营者的信用评价均由各大电商平台判定，缺乏全国性的、统一的网络交易信用评价标准。一些电商平台在解决消费争议的同时，存在权威性不够、专业性不强等问题，亟需更多专业人员和司法机构参与其中。

■ 推进数据共享 实现社会共治
网络售假售劣治理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共性难题。近年来，我国通过强化制度建设等手段净化网络交易市场环境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其中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规定，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，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。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、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，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

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郭子梁认为，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是良好的开端，但接下来仍重在落实。网络市场监管需要把握电商平台这一关键环节，在执法过程中做到既规范市场，又不伤害市场的活跃度。

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负责人郭颖建议，网络假货治理需执法机关、品牌权利人、消费者、平台等各方共同努力。

“红通人员”姚锦旗被提起公诉

新华社杭州3月15日电（记者 岳德亮）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14日依法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姚锦旗提起公诉。姚锦旗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例。

浙江省纪委、省监委发布消息称，在中央、浙江省追逃办的统筹协调下，经多方共同努力，2018年11月30日，国际红通逃犯、绍兴市新昌县委常委、副县长姚锦旗从保加利亚被引渡回国。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，也是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。

绍兴市监委以涉嫌受贿罪、偷越国（边）境罪对姚锦旗进行了立案调查，并于2019年1月29日移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。

张思德：为人民服务的平凡英雄



新华社成都3月15日电（记者 卢宥伊）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迎接红军来家乡、长征途中艰难跋涉、奔赴抗日战场、给毛泽东当警卫战士、执行烧炭任务中不幸牺牲……四川仪陇县40余名来自张思德纪念馆、公安局、学校、社区等单位的“草根演员”，为家乡干部群众上演了红色歌剧《张思德》，向革命英烈张思德致敬。

张思德，1915年4月出生于大巴山深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。重病的母亲没有奶水，只得走东家，串西家，要来谷米捣碎熬成糊喂他，因而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“谷娃子”。出生仅7个月，母亲就因病无钱医治离开人间，父亲张行品被迫把他抱给婶母收养。谷娃子吃“千家奶”穿“百家衣”长大，养母为了让他永记乡亲们的恩情，给他取名“思德”。

1933年2月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。1933年12月，张思德参加红军，不久加入共青团，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，三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、草地。他勇敢机智，曾只身泅水过江，夺得敌人的渡船，为红军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条件。在川西茂洲地区，他神奇般地一人夺得敌人两挺机枪，被战士们亲切地誉为“小老虎”，一时传为佳话。1936年10月，张思德随部队到达陕北，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张思德始终牢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使命，坚持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并在实践中一丝不苟地贯彻。

据其班长张显扬回忆，有一回，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。一个小战士高兴地嚷嚷着发现了野萝卜，张思德过来检查发现，在水塘旁边果然有一丛叶子绿绿的、模样很像萝卜的植物。饥肠辘辘的小战士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，张思德忙赶上把把叶子先放到自己的嘴里，细细嚼了嚼，味道又甜又涩。不一会儿，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无力，紧接着，他肚子开始剧痛，大口呕吐起来。在失去知觉之前，他还在嘱咐小战士告诉大家这草有毒。半个多小时以后，张思德慢

慢醒来，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，他急忙说：“不要管我，快去告诉其他同志。”

延安时期，因为粮食不足，战士们总是吃不饱饭。通信班的战士都是小伙儿，加上经常外出送信走远路，饭量比较大。为了让大家多吃一些，每次吃饭时，作为通信班长的张思德吃到一半，就不声不响撂下饭碗，提起水桶去打水，让别人多吃一些。

大巴山腹地冬季寒冷不亚于北方，取暖多靠木炭。张思德小时候跟着父亲练就了烧炭的好手艺。1944年初，张思德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大生产运动号召，主动到安塞县石硖谷办生产农场，担任副队长。白天，他巡回各窑，掌握火候。晚上，他也要起来数次，爬上窑顶，观察烟色。窑里温度很高，有的木炭出窑还有火星。但每次出炭，他都是抢先钻到窑的最里边捡木炭，手里包的破布着火了，他就用手弄熄后继续干。

1944年9月5日，张思德和战友小白决定再新挖几个窑，多烧些木炭。当挖到中午时，突然窑顶掉下几块碎石，出现险情。张思德眼疾手快，一掌将小白推出洞口，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，把张思德埋在下边。战士们和老百姓从四面赶来，拼命刨土。小白得救了，张思德却没能抢救过来，他牺牲时，年仅29岁。

为了民族复兴·英雄烈士谱

刷单炒信

几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开工

新华社南昌3月15日电 近年来，电子购物、在线旅游等平台屡屡曝出刷好评、假体验等“刷单炒信”事件。有关人士建议，应进一步完善网络立法，追究相关电商平台责任，多管齐下斩断“刷单”利益链。

“刷单炒信”穿上“隐身衣”

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对“刷单炒信”行为打击力度的加大，刷单炒信业务的隐蔽性有所增强。刷单平台或伪装成购物网站，增加执法部门发现线索的难度；或要求刷手先浏览几个同类商品，再给购买服务的网络经营者刷单，以逃避电商平台的监管。基层办案人员表示，在已办结的案例中，从发现线索到结案的整个过程，“多少都要靠点运气”。

在江西公布的一起网络刷单炒信案中，当事人注册了“××海淘网”（但实际与海淘网并无关联）用于招揽、承接刷单业务。据办案人员介绍，2018年5月份，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了一个来自河南的淘宝店家投诉，称在当地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站上注册做“淘宝拍A发B”任务，免费试用结束后，网站不退还押金，还提出需额外支付手续费。根据办案经验，市场监管人员推测“淘宝拍A发B”任务可能是帮助该淘宝店家刷好评，而该网站是一个有组织的“刷单炒信”平台。

“被投诉的网站看上去和普通的购物网站一模一样，有很多商品。页面上有提示称，注册成为会员后可以免费体验会员产品，还能充值积分。”据办案人员介绍，这其实是网站在招揽刷单业务，但只有圈里人才看得懂；如果不是刷单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产生了矛盾，他们要从辖区内数千个网站中排查到这家招揽刷单业务的网站很难。

江西省玉山县市场和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王剑告诉记者，他们还处理过一起刷单炒信案，是执法人员发现快递员在收取空包裹，再倒查到当事人的店里，在电脑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了刷单事实。“但遇见快递员正好在收空包裹的概率，在日常巡查中是极低的。”

“几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开工”

“刷单几乎是电商行业的潜规则。”多名网店经营者告诉记者，特别是新店开张的那阵子，大家都“刷”，不刷单就没有流量、业绩，店铺就难以被消费者看见。

根据2018年1月1日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，对于“刷单炒信”和帮助“刷单炒信”的经营者将会面临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甚至吊销营业执照。但记者调研发现，基层执法仍然存在困难。

执法阶段的取证难是一大原因。江西省萍乡市市场和监督管理局网络监管科科长李翔玲说，网络经营者只需要几台电脑连上网线就可以开工，而且不一定会在其注册地开展经营活动，但取证需要到实际经营地获取电子证据。

“在线摸排阶段要找到当事人，仅凭我们部门的职责权限有难度。需要公安、电信管理部门的支持，如开通固定电话的真实地址、IP网站真实地址或移动电话经常联系点定位才能锁定。”李翔玲坦言，在未立案的摸排阶段只能通过找熟人帮忙的方法锁定当事人。

江西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颜三忠认为，由于网络监管体系尚未形成，基层市场监管部门也未成立专门的网络监管部门，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往往依靠各自的力量对网络交易进行筛选、甄别，并未建立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。目前查处“刷单炒信”的主要力量是运营商，但由于其企业性质，不具备行政机关职能，其行使监管具有局限性。
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工作人员说，机构改革后，市场监管部门调整为归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筹管理，而电商产业却是各地政府扶持的一大重点方向。他表示，目前“刷单炒信”行为存在“多数违法少数被罚”的情况。